
解放区战场研究的新成果 ——读《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

杨圣清

近几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把研究重点转到两个战场,研究两个战场的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现。但相比之下,研究正面战场的文章和专著要多一些,而研究解放区战场的文章和专著却少了一些。这种不平衡情况的出现,虽有其历史原因和其他原因,但也是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令人感到高兴,它是近几年解放区战场研究中一个新成果。这本专著在思想内容,逻辑结构以及写作方法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堪称是一本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首先,这一专著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了解放区战场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经验,肯定了解放区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

该书认为,解放区战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有的,其具体时间是在1939年春。主要标志是:从陕甘宁边到华北和华中广大敌后地区以至敌人深远后方的东北地区,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与人民密切结合、对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的人民军队;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亦即人民战争路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与中共地方组织共同努力,在华北、华中创建了晋察冀边、晋西北、大青山、

晋冀豫边、晋西南、冀中、冀南、冀鲁豫边、鲁西、鲁中、胶东、豫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对日作战的广阔战场，很好地担负起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这个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该书把解放区战场发展划为4个阶段：1937年7月—1939年春，解放区战场的形成阶段；1939年春—1940年，解放区战场的大发展阶段；1941年—1943年，解放区战场的巩固阶段；1944年—1945年，解放区战场的反攻阶段。这种划分正确地揭了解放区战场的发展规律，深刻地表现了解放区战场形成、发展和巩固的艰难、曲折过程。

关于解放区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关系，该书指出，两者“既互相依存，相互配合，又有着根本区别”，而且两者的根本区别“超出一般作战分工和区域划分”。其中原因，除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诸多特点外，从国、共两党的情况来看，由于两党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仍然存在着阶级的区别和对立，两党保持着各自领导的性质不同的军队，在抗战的问题上各自提出并坚持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和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这是解放区战场同国民党正面战场形成并且不同于一般作战分工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纠正了当前存在着的一些形而上学观点。

关于解放区战场存在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有，一种认为无。该书持前一种观点。但认为“这个战略反攻阶段的时间，应从1945年8月上旬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地区向日宣战开始”，“1944年解放区战场的反攻是局部性的战役反攻，不具有全局性质”。这种观点虽然还缺乏充足的说服力，但却不失为一家之言。

此外，该书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国共两党军队之间“摩擦”与反“摩擦”斗争以及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的起点等争论问题，也

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使读者受到启迪。

其次,该书从始至终都贯彻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和实事求是精神。历史著作贵在真实。该书作者,敢于正视历史矛盾,毫不掩饰矛盾,对历史事实如实地加以叙述,然后加以分析,指出其是非。例如,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作者并不回避,而是以一定篇幅叙述了这种斗争;同时又着重分析了这种“摩擦”产生的原因,论述了中共在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大方向的同时,进行反“摩擦”斗争的必要性,指出中共是为抗日而进行反“摩擦”斗争,揭示了“摩擦”和反“摩擦”二者目的和性质的原则区别。对中共在反“摩擦”斗争中某些策略失误和“左”的表现也如实地予以承认。

对抗战中中共领导人的评价,该书作者也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如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所犯错误该书指出:“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大大膨胀。但从中共本身来总结教训,如果能及早采取措施,果断转移,至少是可以减轻损失的。在这方面,由于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思想麻木右倾,应负主要责任。”但该书又客观地指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损失,“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也应考虑进去。例如,延安对形势的分析、对国民党当局反共的决心和彼此实力的估计一度失误……‘华指’发动曹甸战役造成的影响等。”该书结论:“对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包括对项英这样一位党的早期活动家、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已不能为自己作辩护的烈士,也不应把不属于他的错误或不完全属于他的错误归之于一人,更不应否定一切。正确的态度是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从多角度考察,做到功过分明。”

还有对百团大战这一解放区战场最大规模的战役,作者也同样采取实事求是态度,既充分肯定了这次战役的功绩,又指出应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该书指出,在取得第一阶段序战胜利后,对敌人兵力分散的弱点估计过重,因而提出的大破击的要求过高;在战

役第二阶段, 强攻敌人坚固设防据点, 造成攻坚部队较大伤亡, 等等。这种科学分析和实事求是精神, 就使读者增加了对历史的真实感, 更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再次, 这一专著在写作方法上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 在组织结构上, 每一章的开头, 都用一节来专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这样就把中国抗战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把解放区战场的斗争同全国抗战形势紧密联系起来, 进一步衬托出中共领导敌后抗日力量在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上每章每节对国际、国内敌友我三方的战略、政略所作的论述, 充分体现作者分析问题的多视角。

第二, 该书基本上摆脱了传统框架的束缚, 把一般的历史叙述和专题研究结合起来, 既照顾到全面, 又突出重点, 把问题引向深入。同时, 该书在写法上有详有略, 繁简得宜, 层次分明。如对于战役战斗的经过描写都比较简单, 而对中共中央战略决策, 各战区发动战役、进行反“扫荡”的背景, 高层活动的意图则相对地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就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和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

第三, 夹叙夹议, 史论结合, 融为一体。该书作者掌握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但并没有罗列史实, 而是挑选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实, 通过对它的分析和评论, 来说明历史事实的本质和相互联系, 揭示出其规律性的东西。

以上3点显示了这一专著的特色及它的学术价值。当然, 这一专著也不是十全十美, 没有缺点和不足之处的。

首先, 该书在结构上有不完善之处。全书按解放区战场发展的4个阶段划分为4章, 最后仅用300多字来结束本书, 显然是有点简单了。如果作者在末尾再加一个结束语, 对解放区战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特点、作用、地位以及经验, 作一系统、完整的论述, 那一定会使读者对解放区战场和作者的观点有深一层的认识 and 了解。可惜, 该书少了这一点睛之笔。

其次,该书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在引用史料上不够全面。如在第3章讲到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时,列举了解放区制定颁布的许多法规、条例和条令,但其中所举者皆为陕甘宁边区的。其实,当时在各个解放区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和条令。拿“施政纲领”来说,陕甘宁边区颁布了“五一纲领”,晋察冀边区颁布了“双十纲领”,晋冀鲁豫边区颁布了“施政纲领”15条,晋绥边区和山东省分别颁布了“施政纲领”14条和15条。在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也都制定和颁布了“施政纲领”。其他如选举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均如此。当然,陕甘宁边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其制定的法规、条例和条令有示范意义,为各解放区所参照和借鉴。但各解放区所颁布的法规、条例和条令也不是照抄陕甘宁边区的,而具有其地区特点,因此,也应当介绍。

第三,该书对个别问题的提法也有不确切之处。如第348页讲到解放区政权建立情况时说:“到1939年前后,各战略区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大体上都建立起来了。”这个时间早了点。确切地讲,各战略区的敌后民主政权的建立,除晋察冀边区最早,建立于1938年1月外,其余都是建立在1940年1月和3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发表之后。如1940年2月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3月24日第一届皖东北各界人士代表会决定成立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7月26日山东省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战时推动委员会;8月1日成立冀太联合办事处;11月苏北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次年4月成立鄂豫边区行政公署;8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决定成立晋冀鲁边区政府……可见,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的发表,对敌后抗日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学部)

(责任编辑:荣维木)